



DUNHUANG
TUBOWEN
SHULUN
WENJI.

敦煌
吐蕃文
书论
文集

王尧 陈践 编著



类号	26.32847
登记号	27902

王尧 陈践 编著

敦煌吐蕃

文书论文集



四川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罗润苍
封面设计：梅定开
技术设计：李明德

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

（汉文版、附藏文原文）

王尧 陈践 编著

四川省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省雅安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印张20.25 插页5 字数367千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书号：M11140.65 定价：7.00元

ISBN 7—5409—0062—8/K·14

前 言

〔一〕

从德国兴起的历史语文考证学派，对近代西方史学有广大而深远影响。通过早期在德国留学的学者，对我国史学界也影响至大，象倪卜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和兰克（Leopold Ranke）历史语言考证学派大师以及他们的门人活动，在我国曾有过著名的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及所谓“以汉还汉，以唐还唐”的美谈；从历史上竖着看，对民族语言的重视都是属于明显的这一派的流韵余风。

兰克氏曾说：“重建过去如当时发生一样”（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是一种典型的客观史学，也就是对史料学的重视，陈氏寅恪先生由此而得出从“史实中求史识”的结论，曾鼓励一大批学者从语文入手研究边疆；韩儒林、翁独健、王钟翰、王静如、马学良诸先生都是这方面的大师。

陈寅恪先生曾慨叹：（敦煌学）“自发现以来，二十余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

数人而已”（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二三六页）。陈寅恪先生以其力作：《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发前人之复，开一代新风，以藏文、蒙文、德文、拉丁、梵文几方面之力解决吐蕃历史的一个问题，直如雄师搏兔，功力之深，铸为铁案，传为史学名篇。汪荣祖氏赞为“开拓一条近代研究之路，并提供方法与线索，以待来者”（《史家陈寅恪传》，一一一页）。这几位前辈开创的道路对后学如我们一辈确实有启蒙发聩的作用，使我们认识到民族语文对我国历史研究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陈寅恪先生在总结王国维一生对史学的贡献时曾概括为三点：

- 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 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
- 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

（均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二一九页）。

陈氏本人也正是用这种方法进行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身体力行者，成为一代宗师的。这是史学上的乾嘉学派学风的继承与发展，对我们研究边疆历史的人影响极大。当他年轻时游学海外曾寄其妹一信，信中可以看出他对民族文字（具体来说，指藏文）的浓厚兴趣：

“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我所注意者有二：

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
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为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藏、汉文）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正确之解，其余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陈寅恪：《致妹书》，原载《学衡》，二十期，1923年8月；此处转引自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五三页，1984年2月版）。

因而，我们在二十多年中悉心研究藏文，想用藏文史料来补足我国藏族古史——吐蕃史，这是我们一点拳拳之衷，敬希同道察谅者。

〔二〕

我们把近几年中研究的成果编为这本《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这是《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和《敦煌蕃吐文献选》二书的继续。瞻望前程，免不了要把近十年中（1976—1986）敦煌吐蕃文书研究总貌做一番鸟瞰式回顾。受到大家注意的两件事：其一，1983年，在兰州成立了中国敦煌吐蕃学会，从组织上支持了研究工作的开展。其二，巴黎出版了法国科学院和巴黎国立图书馆合作影印的《敦煌吐蕃文书选》I、II两辑（1978，1980），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这两件事，标志着敦煌吐蕃文书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摆脱了过去孤军奋斗，踽踽独行的寂寞，而且比较容易地获得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因而，研究成果源源问世。我们在近六年中，出版了三本专著：

1.《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98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藏汉对照版)。

2.《敦煌吐蕃文献选》(1983年,四川民族出版社,汉文版)。

3.《敦煌本藏文文献》(1983年,民族出版社,藏文版)。

此外,还有下列论文发表:

1. P.T. 1283号—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载《敦煌学辑刊》1982年2期)。

2.敦煌藏文写卷 P.T. 986号—《尚书》译文证补(载《藏学研究论文集》(1982年))。

3.敦煌古藏文写卷P.T. 1057号—藏医杂疗方译释(载《中华医史》1982年3期)

4.敦煌古藏文写卷 P.T. 127号、1044号—藏医灸法残卷(载《中华医史》1983年1期)

5.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译本介绍(载《西藏研究》1983年1期)。

6.敦煌古藏文《礼仪问答写卷》译解(载《西北史地》1983年2期)。

7. P.T. 1071号、1073号、1075号吐蕃律例文献(敦煌吐蕃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讨论会论文(载《甘肃民族研究》增刊,1983年))。

8.敦煌藏文写卷 P.T. 1088、1085号研究(载《历史研究》1984年5期)。

9.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 P.T. 1047、1055号译释(载《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3期)。

10.敦煌本《瑜伽师地论·菩萨地》藏汉对照词汇考论校录

（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2期）。

由于历史的原因，吐蕃文书的绝大部分流落在海外，分别度藏于伦敦、巴黎两地，西方学者得以尽先利用文书进行研究，其先驱托玛斯（Thomas）、劳费尔（Laufer）、巴科（Bacot）戴密微（Demiveller）、拉鲁（Lalou）诸家已先后谢世。如今健在的有：乌瑞（URAY）、石泰安（Stein），还有罗纳达斯（Ronatax）、布隆多夫人（Blondeau）、斯巴里安（麦克唐纳夫人 Sparian）于伯赫（Vebach），以及佐藤长、山口瑞凤、木村隆德、今枝由郎，还有著名的华裔学者李方桂、张琨、藏族学者噶尔美（Karmay）、南喀诺布（namkha norbu）等。

如前所述，我们研究吐蕃文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一批吐蕃文献来认识吐蕃社会的各个方面，诸如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关系、宗教思想、文化渊源……。过去，我们已发表的三本吐蕃文书研究专集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由于个人水平所限，未能达到理想，今后要更加努力去探索。

下面重点介绍一下几个不太为人们注意的方面：

第一、关于占卜的文书。过去，只有巴高、劳费尔等少数几位讨论过并发表了《吐蕃的鸟卜》专文（1914年《通报》），后来就再无人问津，形成绝唱。这次，我们在本集中，有三篇文章：一、《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P.T.1047、1055号卷子译释》。二、《吐蕃的鸟卜研究》（补充劳费尔氏的论文）。三、《三探吐蕃卜辞》。吐蕃的先民和其他民族的祖先一样，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中，积累着认识事物的知识，这一过程充满了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悲哀。一次次，扑朔迷离，难以捉摸，产生了怀疑、犹豫和不安。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认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前兆现象，藏语为Snga-ltas，吉兆称

为bzang, 凶兆称为ngan。古代产生的掌握占卜技术的大师就是解释前兆现象的专家, 这些人实际上是群众的导师和朋友。他们根据兆象指导人们免灾趋福, 转危为安; 上至上宝, 下至百姓, 谁也不能例外。在汉文史籍中也早有记载, 如:《新唐书·女国传》中对吐蕃先民占卜活动的描写和观察极为生动、周详, 就是有名的“鸟卜”; 此外, 还有骨卜、骰卜和金钱卜等等。可以看出吐蕃人和古代汉人之间在思想、哲学心理上有某种共同的或者相通的东西。我们在文中把这一类占卜文书解释、翻译出来, 是把它当作初民的思想文化发展的遗迹来看待的, 希望通过它们来了解古人各种活动(生产、生活、战争、婚姻……)的一个侧面。是否达到这一目的了, 请读者检查、指正。

第二、关于古代语言的文书, 具体地指伯·3301号卷子《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对照词汇。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卷子, 说明在公元八—九世纪, 藏族学者已经编辑了这一本汉藏双语对照词汇, 是词典学上的光辉成就。而《瑜伽师地论》这部伟大的著作, 藏汉译本之间的血缘关系, 可以从而坐实。这一工作, 早在六十年代已由李方桂教授研究, 发表在《通报》上, 引起国际藏学界普遍赞颂。我们仅仅觉得李先生的文章是用英文发表的, 藏文也都采用转写形式, 国内很少有人见到, 而且《瑜伽师地论》一书汉藏文章节比勘对照的工作也可补充, 因而才在李先生文章的基础上狗尾续貂, 写一点心得, 敬希读者注意, 有兴趣者还可设法找出李著英文本来阅读。这里需要强调一下, 这一词汇集比起《翻译名义大集》(Māhāupatti, bye-brag-tu-rtogs-pa-che-ba)来也毫不逊色, 可以看作吐蕃时期学者们翻译工作积累的工作手册。也就是藏文词书的滥觞。

第三、关于吐蕃礼仪的P.T.1283号长卷。这个卷子的重要

性在于它反映了吐蕃时期的伦理哲学，它介于法律和宗教之间，在社会上起着润滑剂的作用，既不象法律律条那样冰冷无情，又不象宗教说教那样虚无飘渺，它是用充满人情味的语言阐发对社会、人际关系的全部观点，对吐蕃社会有极大的认识作用，希望它能引起读者注意。

第四、集中收纳了《医马经》和《驯马经》两个专业性很强的卷子，目的是把这一项目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来对待，兽医学与古代医学有某种相通之处，而驯马术又是为了生产、战争和交通、畜牧业的需要而产生的技术。对此我们不可忽视。

至于集中有关社会经济的契约、书翰、诉状等等，性质已十分明确，毋庸饶舌，读者会发现它的价值所在。

〔三〕

从国际藏学范围来看，敦煌卷子的发现曾掀起两个高潮，其一，《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940）的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兴趣。第二，《吐蕃僧诤记》（1952年；汉译本，1985年，耿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展开了普遍的追索和辨诂。这两次旷日持久的争论，对于吐蕃的历史、佛教史和文化交流史表现出极为浓厚热烈的兴趣，导致对整个藏学研究工作的深入，极大地推动了研究事业向纵深发展。

我们学力所限，错误、挂漏之处，衷心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编著者

一九八七年春节

出 版 说 明

本书是1983年本社出版的《敦煌吐蕃文献选》的续编，分为汉文和藏文两个部分。

汉文由前言、16篇论文和20篇译文组成。论文是近几年来作者的研究成果，内容有关于吐蕃时期宗教、社会经济、民族关系、语言文字、占卜、伦理道德、兽医、驯马等几个方面。部分稿件曾在国内外发表过。收录的20篇汉译稿，给不能直接使用敦煌古藏文的学者提供研究上的方便。

鉴于敦煌藏文手卷于本世纪初被先后劫往国外，国内学人查找不便，因此，凡本书涉及的有关藏文原文均全部给出。藏族学者东嘎·洛桑赤来教授为藏文部分写了序言，作者对所录藏文撰有说明并做了一些必要注释，为没有机会接触这部分藏文手卷的学者提供一些原始资料。在此特别说明，以引起本书读者的注意。

编者 1987年2月19日

目 录

前 言	(1)
榆林寺庙产牒译释	(1)
从一张借契看宗教的社会作用	(10)
P.T.1111 寺庙粮食帐目清单	(19)
民间借贷文书译释	(23)
书契杂件	(28)
P.T.1297, 收割青稞雇工契	(31)
归义军曹氏与于阗之关系补	(33)
吐蕃占有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探索	(42)
P.T.1077 都督为女奴事 诉 状	(54)
P.T.1256 于阗遣使 名 单	(63)
敦煌本《瑜伽师地论·菩萨地》藏汉对照词汇考论校录	(65)
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	(74)
吐蕃的鸟卜研究	(96)
三探吐蕃卜辞	(103)
敦煌古藏文《礼仪问答写卷》译解	(123)
《医马经》、《驯马经》残卷译释	(148)

P.T.990	如来调伏国王篇·····	(166)
P.T.1297 ₂	为牧放羊群入田之诉状及判词·····	(172)
P.T.1096	亡失马匹纠纷之诉状·····	(174)
P.T.1084	博牛纠纷诉状·····	(176)
P.T.1087	善善不得逃逸甘结·····	(178)
P.T.1188	登里回鹘可汗告牒·····	(179)
P.T.1113	陇州军镇会议告牒·····	(183)
P.T.1185	军需调拨文书·····	(187)
P.T.113	大论致沙州安抚论告牒·····	(189)
P.T.2204	设收叛乱者粮食支出帐·····	(190)
P.T.1189	肃州长官向天德王禀帖·····	(192)
P.T.1211	肃州色戛致索尊文书·····	(194)
P.T.1131	张安札芒古禀帖·····	(195)
P.T.1212	云善致安善子延等书·····	(196)
P.T.1201	金刚致僧统洪誓书·····	(197)
P.T.1129	库公珠致僧录禀帖·····	(198)
P.T.1003	伊州李僧政贝登致沙州李僧政文书·····	(199)
P.T.1123	为赞普赤祖德赞诵《无量寿经》功德愿文··	(200)
P.T.999	为赞普赤祖德赞缮写《无量寿经》卷数册 ·····	(202)
P.T.1001	尼众诵经登录册·····	(203)

榆林寺庙产牒译释

——P.T.997号吐蕃文书写卷研究

一 解 题

P.T.997号吐蕃文书写卷，36行。除尾端略有残损外，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件完整的卷子，全名应是“瓜州榆林寺之寺户、奴仆、牲畜、公产物品之清册”，这是瓜州著名的榆林大寺所属的寺庙财产登记一览表。公元787年吐蕃全面占有瓜沙以后，改变了原来的“打了就走”、“劫掠粮畜”的做法，而采取了稳扎稳打，逐步巩固既得地盘的积极的新方针。从本件中可以看出，这时，对经济特别予以注意。在瓜州地区设有“大岸本”（mngan-chen）一职，专门管理经济事务，同时兼理包括寺庙财产在内的公产。在榆林寺内又设有专管一个寺庙的“岸本”（sgo-mngan），如我们所见，派了吐蕃在敦煌一带长期驻扎的军事部落孛三部落（phyug-mtsams）的赞拉囊充任。看来，对于寺庙财产是采取了严格的军事管制的。大概是为了控制在意识形态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僧侣，防止寺庙经济被侵占吞没而采取的保护性措施。在榆林寺庙产登记册上，载有“于鼠年春□□住持沙

门乔吉旺布、寺院长老、军官与悉编（观察使）、论藏热、尚资心赞、论绮立湊节诸人，在大和尚座前供奉……”等文字。这个鼠年春，应是吐蕃占有瓜沙后不久的子年，似在796（丙子）和808（戊子）之间的一个子年较为合适。而且，文件提到的这位大和尚，地位如此崇高，当地的军政长官，寺庙长老、住持都要到他的座前办事，不是一般人，应该是具有十分权威的一位，而且应是汉僧大和尚，那么，我们不能不联想到著名的摩诃衍了。这位大师奉赞普之诏到逻些传播禅宗顿门一派，在吐蕃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意识形态上的大争辩。详情见伯4646号汉卷《顿悟大乘正理决序》。戴密微氏（P. Demivelle）撰写了名震一时的《吐蕃僧诤记》（此书由耿升同志译为汉文，198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从而引起关于禅宗在吐蕃传播的故事，其人物、地点、辩论内容及结果的论争，异说纷云，形成一场轩然大波（详见张广达：《唐代禅宗的传入吐蕃及有关的敦煌文书》载《学林漫录》第三集，1981年）。

这位大和尚在吐蕃王廷的活动告一段落以后，可能是光荣地、也可能是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敦煌。但他以吐蕃宫廷密使身分仍在左右着敦煌的政局，经常把当地情况上报宫廷，起了宫廷耳目的作用（参看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一文，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1期）。据此，我们想这一文件中的大和尚极有可能就是这位“明标法印，手说真宗”的大乘和尚。如果这一假设能够成立，那么，我们看吐蕃当局如何处心积虑地争取宗教界的合作，尤其是争取宗教界的上层（象摩诃衍）实际上就是争取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合作，是下了一番苦心的。斯0381：《龙兴寺毗沙门天灵验记》就有关于“大番岁次辛巳（公元801年）闰二月十五日，因寒食在城官僚

百姓就龙兴寺设乐”的明确记载。看来，寺庙起了缓和民族矛盾，加强官民沟通的润滑剂的作用，同时，也能反证出本件的年款。斯2729：《二月□十使论悉诺罗接漠勘牌子历》，为吐蕃官员申报当地僧尼情况之档案，也可以与大乘和尚的作用相比较。

文中提到“多年来由于长官更迭频繁”，反映了吐蕃军事行动在继续，吐蕃的疆域日益扩展，许多老资格的长官又被调往前线或新占领地区，去担当更高、更重要的职务，瓜沙一带只能又用一批新提拔的人员补充上来，所以频繁更迭。为了保证统计的准确性，不致因人员更动而有所失误，提出了“每七年重新登记一次”的办法。原来寺庙大概是归瓜州地面大岸本统一管理，现在开始，在寺内专门设立岸本，专司其事。而且是“登记表一式四分”分别送到宫廷、寺庙住持、当地寺庙、当地长官，这是为了防止以后的纠纷和口舌。可以看出吐蕃人在占领敦煌以后学习行政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取得多么惊人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寺庙所属寺户除了二十家唐人以外都是鰥夫、孀妇、老汉、老嫗和单身男奴、女奴。看来，榆林寺作为寺庙，它收容的是无依无靠的闲散人口。可怜唐人二十家，也算是失去了政治凭依的孤雁，与鰥寡孤独相提并论了！

从财物登记中看出大宗的是牲畜、油粮、用具，其中还有五百五十张整纸，很令人感到兴趣。我们知道，缮写经卷是当时的风尚，寺庙中养着一批缮写手（经生、学士郎），如斯0214卷子：“永安寺学士郎杜友遂书记之耳，甲申年三月二十三日，永安寺学士郎杜友遂书记之耳”和斯0341号题记：“敦煌镇经生张显昌所写经成记，用纸二十张，典经师令狐崇哲，校经道人。”即是二例。他们为人们写经，做功德。我们今天能见到如此众多的

敦煌写卷不是应感谢那些无名的书写圣手经生、学士郎么？

至于油的贮存，除了食用之外，还要点灯做佛事，敦煌地区有一专门行当叫做“梁户”，就是在寺院的寺户中从事经营活动的。请参看姜伯勤的《敦煌寺院文书中梁户的性质》（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3期），文中颇为详尽地引述了日本那波利贞、竺沙雅章，法国谢和耐等人的关于油的生产研究的成果，足资了解这一方面情况的全貌。

二 译 文

P.T.997 瓜州⁽¹⁾榆林寺⁽²⁾之寺户、奴仆、牲畜、公产物品之清册

瓜州地面寺庙产业大岸本（总管）古日赉卜登与谢卜悉斯之书办王悉诺栾⁽³⁾与榆林寺寺内岸本（总管）擘三（部落）赞拉囊长官及其麾下之榆林寺顺缘寺户、财物、牲畜、粮食、青稞、大米、物品等登记簿本清册，为鼠年春于□□宫，住持沙门乔吉旺布、寺院长老、军官、悉编（观察使）论藏热、尚赉心赞，论绮立读节诸人于大和尚⁽⁴⁾座前集会供奉……登录寺庙财产之僧统⁽⁵⁾所公有。沙门没庐旋奴洛卓与茹本绒巴拉努斯之驾前管理顺缘属民、财物、粮食之长官：内府役使辛·玛金与茹帖达乃穷、东本若·毕悉诺猎、洛悉诺勒、达聂悉曼勒、年野卜藏等人，清点财物。

瓜州地面寺庙顺缘诸寺户，往昔由住持沙门文殊师利登记入册。此后，多年间，长官更迭频繁⁽⁶⁾，寺属民户与财物、粮食等清册上，未再更改，兹乃下令更改，重立清册。今后，每七年重新登记一次。超越此规定，给予惩处，照此执行。